

红墙纪事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丛 书 名：现代文学

书 名：红墙纪事

作 者：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 版 社：学苑音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ISBN：7-88050-475-3/I27

定 价：10.00元

第一章 从西柏坡到北平，毛泽东“进京赶考”。双清别墅

“不速之客”不愿搬入中南海

古都新生

1949年开年。北平，瑞雪纷飞。古老的城墙如披玉甲，更有千树“梨花”竞相开放。这一天，在那道经历过无数封建王朝变迁的高大城门口外，浩浩荡荡开来了一支支整齐威武，军仪雄壮的大军。一块块的方队，一辆辆的战车，缓缓的穿过幽深而神秘的城门，出现在北平城的大街上。

北平欢腾了……

北平新生了……

手持小旗彩带的百姓，兴高采烈地涌上街头，参加庄严而隆重的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纵情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到处是欢迎的口号声浪，到处是喧天的锣鼓鞭炮，京城的人们盼望了多少年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一位年逾花甲的老者指着手上一面粉红色的小旗对身边的老伴说：“记住这旗上写着的时间了吗？这可是咱们北平人最不能忘的日子呀——”

老伴眼里闪着喜悦的泪光，喃喃地连声说道：“放心吧，忘不了，忘不了的！”

是呀，这日子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更是刻在几百万北平市民心中的呀！它就是1949年1月31日。

同一天，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中央统战部行政处长周子健、统战部交际处第一处长申怕纯、统战部交际处第二处长金城等4人拿着周恩来副主席的手令，连夜坐卡车从西柏坡赶到北平，为党中央迁入北平打前站。

他们走后不久，周恩来一封电报赶在他们之前到了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手里。周恩来要求打前站的同志把中南海先接收下来。齐燕铭是蒙古族，办事如快刀斩乱麻，是个急性子。他没看完入城式，就和另外3位战友分头去接收中南海了。

中南海是傅作义的“剿匪”司令部。北平和平解放后，整个中南海2000余间房子只有勤政殿住着傅作义的一个连。他们像乌龟一样缩在勤政殿里，只有几盏孤灯发出微弱的光。

齐燕铭清华北军区程子华兵团派了一个连进驻中南海，他们让傅作义的连队放下武器走了。周子健是从北门走进中南海的。这个大门，后来成为国务院管理局的出入之处。

“这里还可以走进去吗？”周子健问看门人。

“早先，这里是公园，现在什么也不是了，但4个大门全畅通着呢。”

“太谢谢您了。”

周子健大步往里走，走了几步，这位土生土长的北平人回头给了看门人一个灿烂的微笑。

就是这个微笑，深深铭刻在看门人的心里。

看门人叫夏友廉。后来他志愿给解放军服务，一干40多年。

那时，别看他看门，却关心时局变化。傅作义在中南海开会时，由夏师傅倒茶递水。有一次，夏师傅递毛巾给傅作义擦汗，发现傅作义一脸愁云，

他想，看傅作义这样子，没准儿北平还真打不起来呢。

瞧瞧不是，解放军都开进中南海了。

第一次来到中南海的齐燕铭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萧条破败的图景。太液池中尚未开化的冰块呈现一片黑紫色；没有树叶的各种杂树东扭西歪；枯叶和废纸遍地，似乎这里几十年前就没有人烟了。

紧接着，齐燕铭等开始布置清扫工作。这时，怀仁堂已经被定为政协会议的会场。正当他们为庞大的计划发愁时，华北军区派来了一支卡车队。于是，卡车队夜以继日地往城外拉太液池里的淤泥。

这些淤泥往少说也有百来年无人动过了。中南海被一团腥臭的空气笼罩着，污水呈不透明的灰黑状。

他们放干了污水。刚刚住进中南海的小伙子们抬来了电网，捕捞水中鲜活的各种食用鱼。

那些日子里，他们天天吃白水煮鱼，吃得直倒胃口。

太液池紫黑的底被大自然风干后，华北军区派了几百名壮实的士兵去挖淤泥。

整整三个月的辛劳。

当夏天的风驻足中南海时，那满池的碧波才真正有了太液的味道。

直到这时，那4位打前站的人才觉得累了。精神的力量确实了不起，这4位随卡车跳跃了40多小时的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进了城，没有休息一分钟，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似乎那一身的疲惫已经成了习惯。

齐燕铭抓总，周子健等3人跑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忙完了1949年的春天。以后，也还是忙，一直忙碌完10月1日，没有休息过一天。

轻骑急驰西柏坡

这是1948年8月3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各骑一匹马，赶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杨成武后来回忆说：“进得屋来，只见正中放着一张高脚八仙桌，四面摆着长凳。毛主席迎门而坐，左首是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右首是少奇和弼时同志。毛主席身后的角上，是一个权作茶几的矮桌，上面放着暖壶和几只战士用的那种搪瓷缸，充满了农家气息。”

杨成武坐在毛泽东对面的长凳上。

毛泽东首先给他们看了两份电报，即1948年7月23日、30日中央军委先后致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

第一份电报的核心是命令东北野战军8日开始南线作战，打范汉杰集团，这就是名垂青史的辽沈战役的开端。

第二份电报是指示先打范汉杰集团，然后打北平、承德、张家口一线的傅作义集团。

杨成武明白了，他的新任务肯定是与傅作义打交道。

毛泽东任命杨成武为新组建的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下令第三兵团进军绥远，把傅作义的主力拉住在平绥线，使他们的兵力出不了关、少出关，以保证东北军的作战胜利。

毛泽东说：“绥远是傅作义的老巢，他们在那里经营了20多年。傅作义

一辈子经营两个兵团：孙兰峰兵团、董其武兵团，一辈子经营绥远，搞了些小恩小惠，群众对他有幻想。他又在群众中进行了像我们对付日本鬼子那样的坚壁清野。成武啊，你们到绥远，得准备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啊！”毛泽东稍事思忖，转向周恩来说：“恩来，你交代薄一波，给他们10万现洋，让他们背着，揭不开锅的时候，就用它买粮食。现在不比以前了，别让咱们的战士像叫花子那样穷。”

杨成武担心：10万现洋得多少人挑啊，怎么带得动！朱德笑了：“我们部队里怎么都是成武这样的‘傻瓜’！你可以用红军时期的办法嘛，连长背50块，排长背50块，分给大家背，化整为零，没吃的就用现洋换，搞不到小米，可以买土豆。”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自日本投降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胜利在望，重新聚首，自有一番欣喜、热闹的景象。

这次会议，要求将全党全军的思想统一到“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建军五百万”，大约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5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目标上来。

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解放战争打了两年，我军从防御转入进攻，共消灭敌人正规军近200个旅，是蒋介石总兵力500个旅的2/5。今后按每年消灭100个旅左右计算，再有3年，歼敌300个旅，打倒国民党，没有理由说不可能。”

这位开创新时代的伟人，没有沉溺在胜利的凯歌声中，他指出妨碍打倒国民党的四个困难：第一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是天灾，即他在中共“七大”上说过的，大旱三年，赤地千里；第三是军事发展不顺利，战争延长，明年打不过长江，只能在江北打；第四是李宗仁等出来“组阁”另立政府，“搞个曲折”。

按照这种设计，5年或者更短、更长的时间之后，彻底推翻了国民党，那么，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构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不同。”

当时，毛泽东对和平解放国民党统治下的城市抱以很大的热情。因为和平解放大城市，不仅能迅速瓦解蒋介石政权，保护大量的工商企业，为建国后进行经济建设做准备；更重要的是，他害怕中国人流更多的血。他曾说过，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太多了。

会议期间，毛泽东找到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说：“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迟疑了一会，说：“恐怕不太容易。”

毛泽东急切地问：“阎锡山有何顾虑？”

徐向前说：“恐怕不是顾虑问题。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阎。结果他

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徐向前见毛泽东的脸色阴沉下来，赶紧补充说：“我们立足于打，但也不放松争取、瓦解工作，尽量减少麻烦。”

毛泽东缓缓地点了点头，说：“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

毛泽东迫切地希望和平解放北平，其中中共政权意欲定都北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949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天，就和夫人朱仲丽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递给王稼祥一支烟，自己也吸了一支，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

王稼祥沉思了片刻：“是不是定在北平？”

“嗯，谈谈你的理由。”

“我认为，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

“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笑着，不住地点头。事实上，王稼祥的看法和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傅作义做了件大好事

辽沈战役后，天津解放，北平 20 万傅作义部守军犹如瓮中之鳖，陷入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中共中央派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参加与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 1949 年 1 月 30 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古老的北平和她的 200 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以完整地保存，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2 月 22 日，傅作义、邓主珊等飞赴石家庄，在石家庄机场上，傅作义的恐慌表情，给专程来陪同他们前往西柏坡的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穿着极普通的布衣，手里提着 10 条香烟，说是送给毛主席的，后来见杨尚昆吸烟吸得很凶，便非要送他两条不可。杨尚昆笑着谢绝了，傅作义不好意思地把香烟又收了起来。

下午 2 时，这行客人乘美式吉普到达了西柏坡招待所。傅作义对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周恩来恭敬备至，并一再表示歉意。周恩来亲切地拉着傅作义的手说：“傅将军，你是俊杰呵，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你比蒋介石先生聪明多了，蒋介石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而你却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北平的和平解放，你立了一大功。原来我们准备在解放区的哈尔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临时政府，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我们就可以去北平开会，你也应该参加这次会议，你既是有党派的，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就更具有代表性了！……”

傅作义被周恩来的这席话感动了，久久地低下头，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不放。

这时期，中共中央书记处的 5 位书记几乎天天都在毛泽东的办公室开会，每晚 8 点左右开始，到凌晨三、四点散会，因此毛泽东的起床时间一般都在下午。毛泽东起床后，周恩来告诉他傅作义已经来到西柏坡，他马上穿

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顶着凛冽的寒风赶到西柏坡招待所。

傅作义见毛泽东走来，连忙大步向前，伸出双手，毛泽东没想到傅作义的第一句话是“我有罪！”毛泽东说：“谢谢你，北平和平解放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你为人民做了件大好事，假如你过去有过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的，也是有功人员。对你的部来说，也是为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保护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和家庭完整。”

“傅将军可以向你的部下讲清楚，既然是和平解决，你原来的部队要进行整编，将来你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和其他人一样看待，绝不歧视。你可能不知道，我们部队里的战士，大部分是国民党那里来的兵，连我们的朱总司令，还有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高级将领，过去也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而且是很有名的。我想，这主要是思想问题、立场问题，思想和立场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办嘛。”

毛泽东讲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八国联军欺负我们，烧毁了圆明园，破坏了许多名胜古迹，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如果我们中国人在这里再摆开战场，相互杀戮，把紫禁城毁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骂我们才怪了！”说到这里，毛泽东指指傅作义，又指指自己，“这个罪名，你傅作义得背着，我毛泽东也得背着，现在好啦，北平和平解放了。”

这时候，周恩来劝大家喝点茶，傅作义利用这个间隙，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毛泽东说：“傅将军，我想听听你将来愿意做些什么工作？”

傅作义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黄河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方面的事。”

毛泽东好奇地问：“军事上你是很有才干的，我还真没想到傅将军对水利工作也感兴趣？”

傅作义说：“我对水利一直有特别的兴趣，过去是身不由己呀。”

毛泽东急忙摇头摆手：“那不行，那黄河河套的工作太小了，给你是大材小用嘛，那样的话，蒋介石也会感到委屈的，你过去是他的堂堂大将军么！我看哪——”毛泽东回头看看周恩来和朱德，又转过头来看着傅作义，“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

周恩来和朱德都笑着点头，说：“好哇！”

“军队上的事，你也别全抛给我们。我们今天是初次见面，我觉得咱们谈得来，能合作共事。你将来不一定去军队做具体的工作，我们可以合作，共同领导和指挥我们的国防军的行动和建设，我相信，你还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毛泽东没有食言。共和国诞生后，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不仅当上了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而且还是国防委员会委员。

“进京赶考”

3月24日上午10时，卫士长李银桥叫醒了毛泽东，毛泽东醒来的第一句话是埋怨李银桥：“我昨天要你9点叫醒我，为什么现在才叫？”李银桥说：“是周副主席的意思，怕您休息不好，路上太疲劳。”

这天，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战略思想的毛泽东，实现了他的夙愿，要大踏

步地前进，到北平去！

午饭后，十几辆旧式军用吉普车，一长溜儿停在西柏坡村边的大路旁，这些美国人制造的马力强大而吼声震耳的战场指挥车，都是前方将士浴血厮杀缴来的战利品。司机和保卫人员早已整装待命，站在汽车的旁边。

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张闻天、李立三、杨尚昆、陆定一、王稼祥等人，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向汽车队走来，看上去，这些中共最高层的领袖们精神格外的好，满面红光。

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走啦，咱们这是进京赶考！”他把进城比喻为“赶考”，这个比喻具有很深的意味。

周恩来说：“我们都要考及格，可不要退回来呀。”

毛泽东非常自信，一挥手：“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然后，十几位中央首长各乘一辆吉普车，告别了西柏坡。浩浩荡荡地向北平方向驶去。

毛泽东随身带的行李十分简单。这位嗜书的领袖带的除了《辞海》、《辞源》等工具书外，就是正在阅读的《史记》、《资治通鉴》。

其他领导人搬走的行李却十分有趣。

建国后，西柏坡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去北京征集到大量文献资料和革命文物，其中朱德的金属桌椅，董必武的拐杖，都是战利品。

朱德的金属桌椅原来共有5件，除桌子外还有4把椅子。当年孟良崮战役结束后，朱德前往部队讲话，陈毅就把缴获的张灵甫的这套桌椅送给他留念。

董必武的红木拐杖非常讲究，上面白银镶嵌篆书寿字4行，每行25字，共100个寿字，故名“百寿杖”。上面还写着“岳父大人六十秋荣庆，婿宋席儒叩贺于鲁维军次”的字样。这是国民党将领宋席儒给其岳父60寿辰的贺礼，淮海战役后，中央办公行政处副处长赖祖烈到前方检查财政时带回西柏坡的。当时董老患肺病，行动不便，赖祖烈便把这拐杖送给了董必武同志。

任弼时随身带往北平的行李中，有一只普通的帆布皮箱，这个箱子，是1938年党中央派他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时，用来存放重要文件和书稿的。1977年6月，任弼时的夫人陈琼英把它赠给了西柏坡纪念馆，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毛泽东等先坐汽车到涿县，再从涿县坐火车直达北平清华园。

叶剑英专门到涿县来迎接毛泽东和党中央。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北平的情况。

他说，北平的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和破坏。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照常，北平的男女老少都称赞北平的和平解放。如果不是和平解放，北平不知道变成了什么样子呢。不管怎么样，和平解放北平，这是给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是一个大奇迹。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上，国都、大城市或重要阵地，不是攻打不下被迫退兵，就是强行攻占，将敌人消灭，有条件的和平解放，在战史上几乎是没有的。叶剑英一口气说了很多。

是啊，战史上见不到，咱们今天就见到了，这是傅作义将军的功劳，他带了一个好头，毛泽东笑着说，今后，南京政府，各地的地方政府和国民党军队，还可能这样做。凡是要求和平解放的地方政府和军队，我们都欢迎。因为这样做，对国家、对人民、对他们自己都有好处。

叶剑英说，北平和平解放时，不少人向傅作义表示祝贺。不少民主人士

也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和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的政府。

毛泽东说，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叶剑英又讲了北平和平解放后，工厂照样生产，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北平的政权机关和官办机构，都派了军官和接管人员。社会秩序很好，也没有发生骚乱。过去那些社会流氓也没有敢出来捣乱。反动分子和潜伏下来的特务，现在还没有公开进行破坏，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时机不到。

毛泽东说，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和平解放的城市一切都照常，这就好了。要对参加军事管制的人讲清楚，我们不但能解放大城市，我们还能管理好大城市。我们人民解放军和全体党政干部，要学会管理城市工作和学会做经济工作，当前来说非常重要。

毛泽东在进入北平的当天下午，就驱车去西苑机场检阅参加平津战役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他穿着一件旧大衣，戴着一顶旧棉帽，站在敞篷吉普车上，深情地望着——排排大炮、装甲车。他也许在心里想，南京不久就会是我们的了。

傅作义也来了。他没有像去西柏坡那样身着军装，而是穿了一件黑大衣，戴一顶礼帽，把两手交叉在胸前，跟毛泽东单独聊了一会儿。

毛泽东袖着两手，又一次对傅作义保护了千年古都而代表人民向他表示衷心地感谢。

后来，毛泽东邀傅作义在会议休息时去天坛游览，高兴地对他说，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呢！

毛泽东夜宿颐和园

毛泽东等进京后的第一个休息地方是颐和园。

这天早晨，北平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来电话，要颐和园管理处主任柳林溪马上到他那里去，说有要事。

柳林溪赶到市政府，见到薛子正，还没有来得及问明白有什么事，他就对柳说：“介绍信已开好，你拿着信乘我的车，马上赶到社会部找李克农部长报到。具体任务，李部长会向你交待的。”

在社会部，李克农看完信后，望着柳，他那张非常严肃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无法掩饰的喜悦。他说：“今晚10点钟左右，党中央毛主席从平山县西柏坡来北平，要在颐和园景福阁休息。你在东大门等候，负责接待安排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休息。”

“保证完成任务！”柳林溪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站起来答道。

晚10点多钟，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来到颐和园。

第一辆车坐的是毛泽东，柳林溪忙上前迎接。毛泽东下车后，亲切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是颐和园的负责人？”柳林溪激动地答道：“我叫柳林溪，是负责人。”这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相继下车了，毛泽东一挥手，说：“走吧！”柳林溪领着他和中央领导同志来到景福阁。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毛泽东就握着柳林溪的手，问道：“你认识我吗？”“认识。”柳林溪说。

早在1943年，柳在延安先后在行政学院、自然科学学院学习，多次聆听毛

泽东的报告。为粉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纺过线、开过荒，在瓦窑堡搞过农场，种烟叶、种甜菜、制过糖。柳林溪简单地将在延安几年的工作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风趣地说：“噢，是你熬的糖，我还吃过你熬的糖呢！”

毛泽东的几句话，使柳林溪本来有些紧张的心情平静了下来。

柳林溪想，主席劳累了一天，该休息了，于是他主动告辞，离开了景福阁。

夜 12 点多钟时，毛泽东打电话来，要柳林溪到景福阁谈话。这次，他详细地询问了颐和园的情况。

毛泽东关切地问：“接管了多少旧职员，多少工人？有没有太监？他们的生活怎么样，有困难没有？”

柳林溪将颐和园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我们接收旧职员 20 多人，工人 30 多人，没有太监。他们大多是年岁大的，青年人很少，生活比较贫苦。北平被包围时，全园职工连工资都领不到了。当时，就要过春节了，职工无法生活，更无法过年啦。我们进城接管后，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报告市政府。从市财政局借来钱给职工发了两个月工资，让大家过年。毛泽东非常关心职工生活，听到这里，赞许地说：“那很好。”接着又说：“对原有职工的生活，我们要包下来，不要辞退，不要解雇，原薪是多少，还发多少。不要叫人家说，国民党时期我们有饭吃，共产党来了反倒没有饭吃了，如果那样就不好了。”

柳林溪回答说：“我们就是按原薪发的。”

听到已经这么做了，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还对公园管理和园林建设作了重要指示。他说：“过去我们在山沟里打游击有经验，进了大城市搞公园就不行了。没有经验，要向老工人学习嘛，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先把原有的公园管好。过去的公园是地主资产阶级悠闲人士逛的，劳动人民一没有钱，二是没有时间逛公园。我们今后还要建设许多新公园，让劳动人民都能逛公园。在劳动之余，有时间在公园休息娱乐，恢复疲劳，再回到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做更多的工作。”

这一夜，他们谈得很晚才休息。

双清别墅的“不速之客”

双清别墅是香山公园的名胜之一，座落在古老的香山寺下。由于这里曾有两股清泉从院子西面高坡上的山石中翻滚而出，水极晶莹，清代乾隆在山泉旁的石崖上题了“双清”二字，由此得名。1917 年直隶（今河北省）水灾，督办熊希龄在香山创办慈幼院，在此修了一座别墅，称为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淡雅幽静，院内山、水、树、石顺其自然，甘冽的泉水汇聚一池，清澈涟漪。池边有亭，亭后有屋，因材施教，秀丽非凡。人们在此，春日赏花，酷夏避暑，秋观红叶，严冬踏雪。由于这里景色美，被称为香山之“园中园”。

那是 1949 年 3 月 25 日，春天刚刚降临到香山脚下，双清别墅的幽静被一批“不速之客”打破了。来的是身穿棉大衣、中山装，55 周岁的毛泽东和他的随员。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时正值中国人民革命处于伟大的转折时期。他来到香

山之后，4月4日发表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重要文章。4月21日又在这里签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在这里指挥了我军南下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4月23日，我军解放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在这振奋人心的时刻，毛泽东坐在双清别墅的六角亭下，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一光辉诗篇，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所取得的这一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还在双清别墅积极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在这里起草了《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和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党成立28周年前夕，6月30日毛泽东又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光辉的历史文献。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工作期间，还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了许多评论，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在这里举行重要会议，研究讨论建国的方针大计。毛泽东还曾在这里会见过许多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及爱国人士等。

“香山事件”

毛泽东等住到香山不久，曾发生过傅作义留下的警卫团的两个营冲击香山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事件。这件事在当时没有见诸报端，后来也没有被人提起。直到42年以后，舒云的《开国纪事》出版，人们才知晓这件曾经被历史遗忘的小事。

根据舒云的披露，当时中央机关对外称“劳动大学”。尽管保密，人们还是猜出了山上住的是毛泽东。原因是歪打正着碰上的。

“劳动大学”被老乡简称为“劳大”，这两个字从京油子嘴里说出来就成了“老大”。

这一天，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正在吃饭，周恩来急匆匆赶来，开门见山地说：

“赶快调一支部队去执行任务。”

聂荣臻有些纳闷儿，今天怎么回事？这位老战友连门坎也来不及迈过，站在走廊台阶上就叫起来了。要是往常，周恩来总少不了打趣几句。

周恩来三言两语说明了来龙去脉。聂荣臻也急了。

他有点埋怨傅作义。尊重他的意见，给他留下整整一个团的兵力保护他。这倒好，到香山“劳动大学”示威去了。

聂荣臻对站在台阶下的作训处长唐永健说：“你带一个团去办，动作要快。”

唐永健坐上辆越野吉普，带着警卫北平独立某师一团士兵悄悄包围了闹事官兵的营院。傅作义的加强团住在翠微路的兵营里。

这个特意留下的加强团中只有一个营没参加冲击香山。而闹事者认为他们没犯什么错误，还和往常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3月的黄昏很短暂，仿佛一眨眼，四周已经披上了褐黑色的轻纱。独立师的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院外制高点。

唐永健驱车直往院子里开。

院门卫兵没多加盘问，任其自由进入。院中士兵已经吃过晚饭，一片和

平景象。

唐永健在进来之前已经命令部队待命准备战斗。

就是这些看来和平的士兵中，有两个营屡次冲击香山。

警卫香山的部队是从延安起就担任中央警卫的一个师。这个师后来抽了一个团组建了中央警卫一团，也就是人们熟悉的 8341 部队。这个师的官兵个个是神枪手。傅作义的两个营士兵冲击香山时没有带枪，叫警卫战士连劝带吓给请走了。

唐永健走进指挥所，找来我方的同志，告诉他们：“情况就是这样，你们去分头做做工作，让他们放下武器，我们握手言和，否则不客气。”

唐永健说：“你们明确告诉他们，就说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了这座兵营，除了把武器交出来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放下武器时，摔摔打打，解放军可要使用武力的。”

几位党代表分头去做工作。3 小时后，他们同意放下武器。

交接武器的仪式立即开始。傅作义留下的最后一支部队，使用的全是在围城时美国空投下来的崭新卡宾枪。

官兵们被叫了起来，他们迷迷糊糊地抓起枪和子弹袋，堆在地中间。然后，又横七竖八地去做没有做完的梦了。

唐永健从值班参谋那里问清了他们团指挥官的住址，驱车进城。三位官员并不知道此刻他们已经成了光杆司令。

唐永健又跑到六部口，找到卫戍区纠察总队的参谋长李青川。李青川一听有人要冲击党中央所在地，当即要去抓人。于是，加强团的三个主要军官被“请”进了拘留所。这一夜，没有浪费一粒子弹。

唐永健返回庆王府时，已是凌晨了。

周恩来几次来电话询问。聂荣臻也很着急。

“司令员，睡了吗？”唐永健绕到窗户跟前，敲了两下窗棂。

“呵，情况怎么样？”聂荣臻并没有睡着。

“都解决了。我拐回来又把团长抓起来了。”

“恩来同志叫你抓了吗？”

“他没说。我觉得应该抓。”聂荣臻没有再说话。

唐永健想：擅自抓人，尤其是抓傅作义的人，抓错了可是要犯政策错误。得问问周恩来去。

周恩来说：“抓得好，这样我们就更主动了。”

收缴傅作义最后一个团的武器一事，周恩来请示过毛泽东。毛泽东同意武力解决，以免后患。

第二天一大早，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也知道了缴枪事件。他找到作训处，叫他们顺便把他那里的一个半连的傅家兵的武器也收掉。

整个“香山事件”圆满解决，但是，有一件事疏忽了，万一出事，那可不得了。40 多年后，唐永健说出来还有些后怕。

虽然那晚上缴了一团士兵的枪，但没有把他们分散处理，幸亏士兵们忙于睡觉，否则，一个团的士兵满北平疯跑，那会给本来就动荡的北平增加多少不安定的因素呵。

那一夜寂静无声，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第二天，傅作义获悉他的一个加强团几乎全被缴械，只剩下不多的部队，于是大发脾气，气呼呼地敲开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的房门，拍桌子大叫。

叶剑英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好言劝走了这位有大功的将军。上午 10 点，傅作义的秘书王克俊找到华北军区。

聂荣臻叫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和司令部作训处长唐永健一起接待这位不速之客。

“傅将军说，你们共产党人不讲信义，过河拆桥。”王克俊一脸怒气。

“你先别急，咱们慢慢谈。”蔡树藩操着浓重的湖北口音说。

“枪都下了，还有什么可谈的！”王克俊从椅子上蹦起来。

“傅先生几十万军队都交出来了，决不会在乎一个团一个营，他为了保护古都立了大功，我们决不会亏待他，这你放心。”

“傅先生留下全副武装的部队，无非是保证他自己的安全。”

“对呀，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卸掉警卫部队的枪？”王克俊愤愤然，“这样，安全有什么保证？”

“说句实话，要保证傅先生的安全，我们比你们顾虑还大。”唐永健说。

“我们更怕蒋介石来暗杀他，然后再满世界造谣说共产党请他起义是骗局，是不是这样呢？”王克俊无话可说。

“退一步说，你能保证目前留下的 4 个大排中没有被蒋介石重金收买去暗杀傅先生的人吗？”唐永健问。

“呵，我没这个把握。”王克俊的口气软下来了。

“我们也不为难傅先生。你回去，挑三五十最可靠的士兵，要那种给钱也买不走的，其余的全部把武器收上来，如何？”

王克俊铁青的脸色淡了一些，脑袋动了动，说不上是摇头还是点头。

后来，傅作义听了王克俊的汇报，怒气退了一半。他亲自挑选了 35 名贴身卫士，每人 3 件长短武器：卡宾枪、驳壳枪和左轮枪。

冲击香山的事傅作义不知道。

但是，他的部下的不满情绪他是知道的。就是他自己，何尝又没有一点怨气呢！

同一天，19 兵团派了两个师级干部去接收这座卸去武装的兵营。

以后，“香山事件”中的那两个营，交给了华北补训兵团，拆散了重新组合。

而没去闹事的另一个营的军官，有一部分被送到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学习完后提升了职务。

至于那几个被抓起来的团座，很快恢复了自由。

新政协第一份邀请名单

初夏的中南海，一片喜气洋洋，沐浴着晚霞的余辉。

由周恩来主持的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1949 年 6 月 16 日在中南海举行。晚 8 时，周恩来、朱德、李济深、林伯渠、沈雁冰、郭沫若、张奚若、陈嘉庚、蔡畅、李立三、蔡廷锴、章伯钧、陈叔通、黄炎培、沈钧儒、马寅初、谭平山等陆续来到。张澜因故未能出席，特派刘王立明代表出席。

说到新政协会议，人们必然要联系到旧政协会议……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 8 年浴血奋战，付出了 2100 余万军民伤亡、1000 亿美元财产损失和

战争消耗，终于赢得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这种时刻，蒋介石对发动内战还有所顾忌，他迫不得已向延安接连发出3次电报，邀请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5年8月28日晚，毛泽东以惊人的魄力和勇气，从延安乘专机飞赴重庆，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历时43天的谈判。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历史上著名的双十协定。这次谈判中有项重要成果，就是双方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出席的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的政治协商会议——历史学家一般简称之为“旧政协”。

3个月后，即1946年1月10日，旧政协会议在重庆隆重开幕。会议历时22天，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5项协议。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上，蒋介石的一些亲信大哭大闹，说政协决议不利于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也沮丧地表示，“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

“将来再说”是一个伏笔。同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11月15日就撕毁“宪草”，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国共和谈由此破裂。

1947年下半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在一年多时间里，歼灭了150多万国民党军队，收复和解放了164座城市。军事上的胜利，解放区土改的深入，以及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标志着全国范围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

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李济深、沈钧儒两先生。电文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

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上海局：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会议名称拟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时间拟在“今年秋季”。

中共中央邀请人士，有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马叙伦、章乃器、陈嘉庚、简玉阶、施复亮、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洁琼等29位著名民主人士。

这是中共中央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所开出的第一份正式邀请名单。

香港秘密“来客”

1948年8月初，中共中央派钱之光秘密潜入香港，同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一起，负责对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交通保障工作。

潘汉年当时的化名叫“小开”（上海话意为小老板），连贯的化名叫“连叔”，俩人授命罗培元直接负责。

罗培元按“小开”提供的门牌号码，依次到准备北上开会的民主人士家里，取走了他们的随身行李，运到维多利亚海湾的小码头，和小船的老板谈好价钱后，正准备将行李装船，冷不防，一个香港巡警出现在他们面前。

身材高大的巡警冷眼盯着罗培元，从头到脚地审视着他，用警棍敲敲行李包，冷笑着说：“来头不小呵！”

罗培元想起“小开”嘱咐他的话，“这件事无事是小事，有事就是大事”，心里顿时紧张起来。巡警掏出一个小本本给罗培元看，还未等看清楚那上面有什么规定，巡警又倏然抽了回去。这个细小的动作，使罗培元悬起的心放了下来：巡警要敲竹杠。

巡警打着官腔说：“你已经触犯了香港的法律，按规定应该带你去差馆接受审查，不过也可以罚款代之。”

罗培元翻遍了口袋，只有大约 30 元，巡警见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收下钱，背剪双手走开了。

罗培元从维多利亚海湾回来，正向连贯汇报，门铃响了，走进 5 个人来。连叔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招呼大家上桌就餐。连叔抱拳说：“各位，今天咱们就不喝酒了，权当我小气罢了。”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喝酒是会误大事的。

饭后，几位先生进了客厅，连叔则在厅门外一言不发，猛抽“三炮台”香烟。看得出来，这位中共在香港的重要负责人，心中很紧张。

过了一会，客厅的门开了，走出一群“陌生人”，那位有军人气质的高个子最引人注目，他已改装成一副苦力的打扮：一身颜色褪成荔枝黄的拷绸裤褂，头顶破毡帽，脚著旧布鞋。到这时，连叔手下的人员才知道，他就是原淞沪抗日名将、19 路军副总指挥、大名鼎鼎的蔡廷锴将军。另外 4 位，是大律师、著名“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先生，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农工民主党执委会主席章伯钧，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常委谭平山和王绍鏊先生。

高大的谭平山和矮小的沈钧儒都留着大胡子，都把大胡子藏进了衣领内；而章伯钧、王绍鏊则穿着长袍，雍容阔绰，一副富商的模样。

见大家哄堂大笑，沈老便认真地问：“打扮得像不像？”

连叔静静地答道：“不抓到你们就像，抓到了，就不像。”大家一个个又恢复了严肃的神情。

又是罗培元提前赶到海边，拣那些由妇女掌舵的小船雇好后，等他们一到，立即开船，在海上行驶半个小时后，这行人登上了大船，抬头一看，是一艘苏联的货轮，他们才高声谈笑起来。

苏联朋友把他们安排进舱内客厅，罗培元的使命完成了，心里顿觉轻松，向大家告别，走向舷梯。这时蔡廷锴将军匆匆赶上来，拉住罗培元的手轻声耳语道：“你回去后，一定给你宗妹（蔡将军的夫人罗西欧女士）打个电话，告我平安。”罗培元笑了。按连叔交给的任务，罗培元不仅力各位先生家中报平安，还把他们的衣服、鞋子等一一送还各家。

用这种化妆的方法，罗培元后来又奉命送走了大诗人郭沫若和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先生。

两个月后，罗培元的身分暴露，住所被搜，他已不能继续留港工作，便被调往粤湘赣地区打游击去了。

1948 年 9 月 29 日，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沈钧儒、蔡廷锴等抵达哈尔滨。

在此稍前的时候，符定一、吴晗、刘清扬、周建人及吴羹梅的代表何惧已经抵达河北平山县李家庄。这里是中共统战部的招待所。

11月5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华南分局，请他们邀请尚在香港、上海的民主人士择机北上。

11月25日，东北局领导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各党派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冯玉祥夫人）等会谈，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如下共同协议：

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5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计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

筹备会一般的决议，经多数通过，全体负责施行；基本方针的决议，如共同纲领及组织政府等，有不同意见时，有不签名或退出筹备会的自由。同时还规定，“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

这份文件，仍将新政协筹备会的会议地点设在哈尔滨。

周恩来改添“启事”（草案）

7月4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叶剑英主持的政协筹备会议第6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等方案）第一次会议议定，由其本人负责召集翦伯赞、蔡畅、李立三、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张奚若组成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由郭沫若负责，组成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为成员的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会议建议，上述两个委员会除由第6组成员参加外，还要请一些学识渊博的专家为委员，委托郭沫若、沈雁冰提出初步名单由常委会作出最后决定。而且要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国歌词谱启事，并定于8月20日为征求截止日期。会上推举郭沫若、沈雁冰和郑振铎立即起草文件交会上讨论修改后提交常委会通过，没有由秘书起草。

这天，周恩来召集新政协筹备会的党组干事开会，进行了责任分工，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齐燕铭负责党派工作；陈云、薄一波负责财经工作；董必武、陈绍禹负责政法工作；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负责军事工作；胡乔木、徐冰、周扬、钱俊瑞、廖承志负责文教工作；李立三、蔡畅、冯文彬负责工青妇工作；连贯、杨静仁负责农民和民族工作。

进行责任分工，已是迫在眉睫的事。因为毛泽东指出：“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迅速”二字，表明毛泽东已决心不再坐视时局的发展，立刻就要解缆远航，将载有4亿中国人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这艘巨轮，驶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会后，新政协筹备会临时主席周恩来又与秘书长等人一起敲定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的代表名额分配。中共中央曾电示以上各局，在推选代表时，应包括工、农、妇、文化、财经、民主人士和私营工商业家等。当讨论到农民代表时，周恩来说：“农民对我们的革命事业贡献很大，这样吧，西北2名，华北4名加候补1名，然后华中3名，东北3名，让这些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乡代表们，都来瞧瞧咱们这改天换地的伟大时刻！”

晚上，周恩来要中共中央统战部电示香港的乔木（乔冠华），邀请并设

法帮助在广西的国民党中央执委李任仁、在云南的国民党中央执委杨杰经港来京，参加这次描绘中国未来前景的新政协会议，并要尽最大的努力保证他们的安全（周恩来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杨杰将军于1949年9月19日由云南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途中，因叛徒出卖，在香港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周恩来回到寓所已是凌晨，办公桌上的案卷，第一页就是那份《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草案）》的清样。

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草案）

本筹备会为征求新中国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特制定条例如下：

一、国旗：应注意：（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赤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二、国徽：应注意：（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

三、国歌：（甲）歌词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毛泽东思想（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乙）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

四、应征国旗国徽图案者须附详细之文字说明。

五、截止日期，八月十日

六、收件地点：北平市政府叶剑英市长转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七月 日

草案全文仅200余字，周恩来改动、增添达14处，仅标点符号就改动了8处，在第一条（丁）项中，他把“色彩以赤色为主”的“赤”改成了“红”；第三条歌词应注意的“毛泽东思想”改为“新民主主义”；截止日期推到8月20日，收件地点改为“北平本会转”。

最后，他又在“七月”与“日”之间郑重填上“十”。

这一天——1949年7月10日，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只差3个月又少9天！

8月5日下午3时，第6小组在北京饭店7楼大厅由马叙伦主持第二次会议，初步议定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位专家为顾问；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聘请马恩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4位专家为顾问。为了便于协调这项工作，请马叙伦参加两个初选委员会。

经过约半个月筹备，第6小组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8月22日上午10时在北京饭店举行。这次，增加了一名列席者——画家吴作人。在一部分应征的来稿中，大家初步选定国旗16幅、国徽4幅交全组再次审选。在紧张筹备的日子里，截至9月14日，第6组先后召开了4次会议以及若干次座谈会。为了供各位委员选阅应征来稿，还在北京饭店设立了临时选阅室，将所有应征稿件集中陈列。